

『三國遺事』的「朝鮮」敘事與高麗王朝 正統性之再塑造

李 磊 *

內容摘要 「朝鮮」在高麗語境中指半島北部地區。『三國遺事』經由檀君「朝鮮」與高麗王畿地域空間一致性的敘事將高麗王朝的正統性上延至司馬遷所認為的信史堯時代。因平壤在邊防與意識形態領域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蒙、麗戰爭中的失守，高麗時人增強平壤認同。『三國遺事』接受唐人以「朝鮮地」、衛氏朝鮮都城、漢樂浪郡城、高句麗都城同為「平壤」的觀點，經由平壤認同，強化朝鮮認同與高句麗認同。該史觀為朝鮮王朝編撰『高麗史』所吸納。『三國遺事』還構建「朝鮮—馬韓—高句麗」的歷史譜系，將半島南部也納入「朝鮮史」之中。經此正統觀的再塑造，高麗末期形成關於朝鮮半島地理、歷史的「東方一統」意識，成為麗、鮮易代的基礎。

高麗王朝承襲自泰封政權，在攻滅後百濟、合併新羅之後，高麗佔據了統一新羅的全部領土。正因高麗繼承了不同政權的歷史遺產，故而自其建立之日起便面臨著正統性論述問題。除此內政需要之外，高麗在遼、金、蒙古諸政權的政治軍事壓力面前，也需要通過歷史來論述其主體性。因而終高麗一朝，歷史論述始終是朝野關注所在，朝鮮半島最重要的史著『三國史記』、『三國遺事』皆編撰於這一時期，正是高麗主體意識的表現。關於高麗歷史繼承意識的研究，學術界成果積累已經十分豐厚¹⁾。朴龍雲對高麗王朝之高句麗歷史繼承意識的檢討，綜合了韓國學界的主要觀點，成為其主要代表²⁾。矢木毅對韓國·朝鮮史

* 李磊，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客員准教授

- 1) 朴漢高「高麗王室의起源——高麗의高句麗繼承理念과關聯하여」(『史叢』第二十一·二十二合輯、一九七七年、서울、高麗大學校史學會)。金光洙「高麗朝의高句麗繼承意識과古朝鮮認識」(『歷史教育』第四十三輯、一九八八年、서울、歷史教育研究會)。孫衛國「傳說、歷史與認同：檀君朝鮮與箕子朝鮮歷史塑造與演變」(『復旦學報』二〇〇八年第五期)
- 2) 박용운『고려의고구려계승에대한종합적감토』(二〇〇六年、서울、일지사)

『三國遺事』的「朝鮮」敘事與高麗王朝正統性之再塑造

系譜建構中民族意識、領域意識變遷的研究，為理解高麗歷史意識提供了更為通觀的學術視野，成為後學者展開論述的基石¹⁾。本文旨在結合『三國遺事』編撰前後高麗王朝的政治情勢，分析其文本中有關「朝鮮」的歷史敘事方式，發掘其所代表的高麗時人的歷史意識，並探究這一歷史意識對高麗末期「東方一統」觀之形成的作用。

一、高麗史處境中的一然與『三國遺事』

明代正德七年壬申（一五一二年）冬，朝鮮王朝慶州鎮兵馬節制使李繼福刊行『三國史記』與『三國遺事』兩部史書²⁾。李繼福跋文寫道：

「吾東方三國本史、遺事兩本，他無所刊、而只在本府。歲久刊缺，一行可解僅四五字。餘惟士生斯世，歷觀諸史，其於天下治亂興亡與諸異跡，尙欲博識，況居是邦，不知其國事，可乎？」³⁾

弘治、正德之際正是朝鮮士禍最為慘烈之時⁴⁾。李繼福一力推行刊印『三國史記』與『三國遺事』有知其國事的目的。據跋文所言，此事為慶州地方官之行為，刊行署名者除李繼福外，餘者皆為慶尚道、慶州主政官員與生員⁵⁾。慶州地方官之所以要刊行「三國」時代的史書，或許與慶州地方意識有關。慶州為新羅都城所在⁶⁾。作為三國相爭的最終勝利者，新羅歷史是『三國史記』與『三國遺事』記述的主體。

與李繼福刊行二史目的相同，高麗國師一然編撰『三國遺事』同樣有其時代性。一然生於高麗熙宗二年（一二〇六年）⁷⁾。這一年剛好蒙古帝國成立，高麗則處於武人政權時代⁸⁾

- 1) 矢木毅『韓國・朝鮮史の系譜——民族意識・領域意識の變遷をたどる』（二〇一二年、東京、塙書房）
- 2) 參見金相鉉「『三國遺事』의刊行과流通」（『韓國史研究』第三十八輯、一九八二年、서울、韓國史研究會）
- 3) 『三國遺事（校勘本）』附「三國遺事跋」（孫文範校勘、二〇〇三年、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第二一四頁。
- 4) 參見福田直子「士禍をとおして見る朝鮮中期の王權」（『史文』第十號、二〇〇八年、奈良、天理大學史文會）
- 5) 生員李山甫，校正生員崔起潼，中訓大夫、慶州府判官、慶州鎮兵馬節制都尉李瑠，奉直郎、守慶尚道都事樸佺，推誠定難功臣、嘉靖大夫、慶尚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安。
- 6) 『三國史記』卷三十四『雜志第三・地理』：「（新羅）末王金傳以國歸我太祖，以其國為慶州。」（楊軍校勘、二〇一五年、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第四六二頁。
- 7) 一然生平，見於「高麗國義興華山曹溪宗麟角寺迦智山下普覺國尊碑銘竝序」，見『朝鮮金石總覽』（朝鮮總督府編、一九七六年、首爾、亞細亞文化社）、第四六七—四七三頁。村上四男『朝鮮古代史研究』付編 第一「『三國遺事』解題目」（一九七八年、東京、開明書店）、第四八七—四九六頁。
- 8) 洪承基「高麗武人政權에 대한 보다 깊은 이해를 위하여」（『高麗武人政權研究』洪承基編、一九九五年、서울、서강대학교출판부）、第二一八頁。

。從高宗十二年（一二三一年）蒙古兵圍困高麗京城開始，直到元宗十四年（一二七三年）三別抄餘黨被滅於耽羅、元朝在耽羅上設達魯花赤，四十年間高麗朝鮮飽受戰爭之難¹⁾。元宗十四年平三別抄後，下旨曰：「今國家多難，天文屢變，欲修德弭災。」²⁾但元宗十五年，高麗又被迫捲入元世祖征討日本的戰爭中去。長期的戰爭使得大量文物被摧毀，其中包括高麗大藏經。作為國師，一然在高麗享有崇高地位，故鄉章山郡，「忠肅王四年（一三一七年），以國師一然之鄉，升為縣令官」³⁾。

『三國遺事』編纂始於忠烈王七年（一二八一年），是年正月元廷頒布郭守敬所撰『授時曆』於高麗。在傳統政治話語中，大一統的重建往往是以頒布新的曆法開始。或許，對於一然而言，這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時間點。同在這一年，高麗再次參與元世祖征伐日本之役，元廷「官軍不返者無慮十萬有幾」⁴⁾。高麗上下動搖了對元廷戰無不勝的信心。如下文將分析的，『三國遺事』主旨在於塑造朝鮮半島自身的歷史文化傳統，這一撰述意願隨着元朝的戰敗而更加明確⁵⁾。在編撰『三國遺事』期間，忠烈王十年（一二八四年）十月，監修國史元傳、修國史許珙、韓康等撰『古今錄』成⁶⁾。這一高麗朝廷主導的修史，也會為一然提供更多的參考。『三國遺事』臨近撰成之時，忠烈王十二年（一二八六年）十一月丁丑，「命直史館吳良遇等撰國史」⁷⁾。可見，一然的修史行為並非孤立事件，而是當時借助修史樹立高麗意識之潮流表現之一⁸⁾。『三國遺事』編撰歷時六年而成，此後不久，一然於忠烈王十五年（一二八九年）圓寂。

作為高僧，一然編撰『三國遺事』以保存佛教傳統為第一要務，編目有『興法』、『塔像』、『義解』、『神咒』、『感通』、『避隱』、『孝善』等與弘法相關的內容⁹⁾。作為高麗國師，

- 1) 『高麗史（標點校勘本）』卷二十七『元宗世家三』十四年閏六月條（孫曉主編、二〇一四年、北京、人民出版社）、第八六六頁。
- 2) 『高麗史』卷二十七『元宗世家三』十四年冬十月辛未條、第八六七頁。
- 3) 『高麗史』卷五十七『地理志二』慶尙道章山郡條、第一八〇七頁。
- 4) 『高麗史』卷二十九『忠烈王世家二』七年閏八月條、第九三七頁。
- 5) 在近代日本學人看來，『三國遺事』撰述目的在於遮蔽三韓與日本歷史聯繫的事實。明治三十五年『校訂三國遺事敘』：「元主忽必烈置征東省。以高麗為導。來寇於我築紫。鎮西諸軍擊殲之。戰敗之餘。麗主至欲驅儒生充軍伍。而一然以高麗人。矻矻著書於其間。惜不使其筆當時曲折。取信於天下後世。抑三韓與我關係。邈在往世。此書所載。有聞及我者。」『新修大正大藏經』第四十九冊『史傳部一』NO. 2039『三國遺事』（二〇〇五年、石家莊、河北省佛教協會倡印）、九五三—九五四頁。
- 6) 『高麗史』卷二十九『忠烈王世家二』十年六月丙子條、第九四八頁。
- 7) 『高麗史』卷三十『忠烈王世家三』十二年十一月丁丑條、第九五六頁。
- 8) 金哲堉「蒙古壓制下の高麗史學の動向」（『考古美術』第一百二十九・一百三十合輯『兮若崔淳雨先生華甲紀念論文集』、一九七六年、韓國美術史學會）。鄭求福「高麗後期の歴史意識과 歴史敘述」（『韓國史論』第6輯、一九七九年、서울、서울大學校 國史學科）。
- 9) 李基白「『三國遺事』の編目の構成」（『韓國古代文學の現在』袴田光康、許敬震編、二〇一三年、東京、勉誠出版株式會社、第四八七—四九六頁）。

一然還有保存政治傳統的關懷。「紀異」編對朝鮮半島早期歷史譜系進行了建構，有關檀君的最早記載便見於『三國遺事』及同時代人李承休（一二二四—一三〇〇年）『帝王韻紀』中。「紀異」編敘曰：

「大抵古之聖人，方其禮樂興邦，仁義設教，則怪力亂神，在所不語。然而帝王之將興也，膺符命、受圖箓，必有以異於人者。然後能乘大變、握大器、成大業也。故河出圖、洛出書，而聖人作。以至虹繞神母而誕羲，龍感女登而生炎。皇娥遊窮桑之野，有神童自稱白帝子，交通而生小昊。簡狄吞卵而生契，姜嫄履跡而生棄，胎孕十四月而生堯，龍交大澤而生沛公。自此而降，豈可殫記？然則三國之始祖，皆發乎神異，何足怪哉！此紀異之所以漸諸篇也，意在斯焉。」¹⁾

上引立論絕非從佛教思想出發，而是借助儒家經典的「天命」論、王朝始祖「異像」論，來論證「三國之始祖，皆發乎神異，何足怪哉」，即為朝鮮半島沒有文字、僅有傳說的歷史予以理證與旁證。這顯示出一然以中國論述帝王之跡的方式論證朝鮮半島歷史的獨立性，——同樣有「天命」與「異像」。在十二世紀金人崛起滅遼、北宋之際，高麗王朝反女真意識高漲、自尊意識強化，仁宗時期一度興起「稱帝建國論」，其宣導者妙清即以「風水」論立論²⁾。一百年後，高麗面臨蒙古的軍事政治壓力，其形勢與妙清宣導「稱帝建國」時相同。上引『三國遺事』文字所體現的「天命」論、王朝始祖「異像」論，思維方式亦與妙清「風水」論類似，隱含高麗的自尊意識，體現對異民族的反抗。

朝鮮半島上的國家統一與民族形成初始於七世紀晚期，此前的朝鮮半島是多族群、多文化往來的場所。除了漢四郡時期的官方文書外，半島西南部的百濟至四世紀晚期才以文字記載本國歷史，東南部的新羅更晚³⁾。一然將傳說寫作信史，並將不同的民族起源神話糅合到同一個故事之中，建構一套統治政權變遷的敘事，從桓雄到檀君朝鮮，從檀君朝鮮到箕子朝鮮⁴⁾。究其本心，一然設定的是，君權從神傳到神之子，再傳到聖賢，由此強調朝鮮半島歷史的獨立性。

如果從高麗建國以來民族意識、領域意識的發展來看，一然上述思想並非孤立出現。

1) 前揭『三國遺事』卷一『紀異上』、第二九頁。

2) 前揭矢木毅『韓國·朝鮮史の系譜——民族意識·領域意識の變遷をたどる』、第一一九—一二七頁。

3) 『三國史記』卷二十四『百濟本紀二·近肖古王』：「『古記』云：『百濟開國已來，未有以文字記事。至是，得博士高興，始有書記。』然高興未嘗顯於他書，不知其何許人也。」第二九三頁。關於文書運用，近二十年來百濟木簡相繼發現，出土地點皆在忠清南道扶餘，為538年百濟遷都泗泚後的文書。新羅文書如京畿河南二聖山城木簡，斷代為6—7世紀。李成市、葛繼勇『東亞視野中的朝鮮木簡』（『唐都學刊』二〇一一年第五期）。

4) 楊軍『略論朝鮮古史譜系的演變』（『黑龍江社會科學』二〇〇一年第二期）。

高麗成宗時期（九八一—九九七年在位）「國粹派」代表人物徐熙，對成宗導入「華制」持消極抵制態度。所謂「國粹」即神仙道與風水思想相結合的高麗土俗佛教信仰。「國粹」思想為高麗「北進政策」的精神支柱，徐熙為高麗繼承高句麗說的宣導者，曾在與契丹的談判中提出對鴨綠江南、北地帶的領土要求。仁宗時代出現的妙清「稱帝建國論」，其指導思想亦為夾雜着神仙道與風水思想的高麗土俗信仰。妙清等以西京平壤為據點，宣導遷都西京，由此引發仁宗十三年（九八三）的「妙清之亂」¹⁾。

如果對比徐熙、妙清、一然的思想，會發現三者處於同一思想脈絡中，其共同點是：一、以神仙道與風水思想相結合的高麗土俗佛教信仰為精神支持；二、隨中國境內地緣政治變動而出現，分別對應於契丹、女真、蒙古之勃興；三、主張朝鮮半島歷史的神聖性與獨立性；四、主張「北進」、強調平壤的中心地位。徐熙、妙清的領域意識十分明確，並進一步演化為政治主張。一然的領域意識主要體現在歷史編纂中，通過對半島北部之「朝鮮」歷史的敘事，為高麗王朝正統性尋找歷史根據。

二、『三國遺事』中「朝鮮」之地望與「朝鮮史」的開端

『紀異』開篇引『魏書』：

「乃往二千載，有壇君王儉，立都阿斯達。（本注：經云：無葉山，亦云白嶽，在白州地。或云：在開城東，今白嶽宮是。）開國號朝鮮，與堯同時。」

一然又引『古記』述：

「以唐堯即位五十年庚寅。（本注：唐堯即位元年戊辰，則五十年丁巳。非庚寅也，疑其未實。）都平壤城，（本注：今西京。）始稱朝鮮。又移都於白嶽山阿斯達。又名弓（本注：一作方）忽山，又今彌達。御國一千五百年。周武王即位己卯，封箕子於朝鮮，壇君乃移於藏唐京，後還隱於阿斯達為山神，壽一千九百八歲。」

上述兩條記載是關於檀君、王儉、阿斯達的最早記載之一，均以檀君為堯同時期的人物。根據撰於十一世紀的『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二』，時人可見『魏書』有王沈『魏書』四十七卷、魏收『後魏書』一百三十卷、魏澹『後魏書』一百七卷、張大素『後魏書』一百卷、又『元魏書』三十卷、梁祚『魏書國紀』十卷。一然所見當不超出『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二』的範圍。今日僅存魏收『魏書』，其餘諸書部分輯錄於類書之中。翻檢現存史料，並無與一然所引『魏書』的相關記載。仁宗時，妙清曾主張定國號為「大為」。矢木毅認為「大為」為「大魏」之訛，在李之氏、鄭知常（與妙清同為「西京三聖人」）筆下，

1) 前掲矢木毅『韓國・朝鮮史の系譜——民族意識・領域意識の變遷をたどる』、第八四—八八、一一九—一二七頁。

平壤爲土德之地，因『史記』卷六十五『吳起傳』有「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及『書經』有「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之語，故擬平壤爲「魏國」、「洛邑」¹⁾。一然所引『魏書』恐爲妙清之徒所造之書，用以宣揚「稱帝建元」、「西京遷都」論。若此推測爲實，則『紀異』開篇引『魏書』表明一然接受了百年前妙清、鄭知常等「西京聖人」之思想，這是『三國遺事』展開的知識視野。

『紀異』引『魏書』及『古記』這兩段記載引出了三個重要問題：國號、開國地點與開國時間。『魏書』所謂「開國號朝鮮」，高麗之前朝鮮半島歷史上有「箕子朝鮮」、「衛氏朝鮮」，地望在今朝鮮半島北部，因而此處「朝鮮」只能是朝鮮半島北部。後三國時期，高麗太祖王建之父歸附弓裔，曾說之曰：「大王若欲王朝鮮、肅慎、卞韓之地，莫如先城松嶽，以吾長子爲其主。」²⁾ 此言將朝鮮與卞韓對言，實以古地名雅稱朝鮮半島北方與南方。再如，高麗文宗將其子分封爲朝鮮侯、雞林侯、金官侯、卞韓侯等，皆取古地名以冠侯號³⁾。朝鮮侯、朝鮮國公常作爲爵位存在於高麗王朝。『魏書』及一然所言「朝鮮」自當不違高麗時語義。

「朝鮮」地望所指爲半島北部，由此可訓通一然所提「朝鮮」國號說與「開城東」開國地點說的一致性。於高麗王朝而言，半島北方的古史是「朝鮮」，近世則是「高句麗」⁴⁾。臨津江、禮成江流域爲高麗王朝及其前身泰封政權的基業所在，此處爲高句麗故地。新羅孝恭王二年（八九八年），弓裔始都松嶽城。孝恭王九年（九〇五年），移都鐵圓。據『三國史記』卷三十五『雜志第四·地理』：

「松嶽郡，本高句麗扶蘇岬，孝昭王三年築城，景德王因之。我太祖開國，爲王畿。」

「鐵城郡，本高句麗鐵圓郡，景德王改名，今東州。」

弓裔松嶽、鐵圓前後兩都皆在高句麗境內。弓裔稱王，明確以高句麗後裔自居，以新羅爲仇敵。「天復元年辛酉，善宗自稱王，謂人曰：「往者新羅請兵於唐，以破高句麗。故平壤舊都，鞠爲茂草，吾必報其讎。」……嘗南巡，至興州浮石寺，見壁畫新羅王像，發劍擊之，其刃迹猶在。」⁵⁾ 在弓裔的敘述中，因其繼承了高句麗的政統，故將高句麗故都平壤也納入其地域認同的範圍，對朝鮮半島南部的新羅，「令國人呼新羅爲滅都，凡自新羅來

1) 前掲矢木毅『韓國·朝鮮史の系譜——民族意識·領域意識の變遷をたどる』、第一二四—一二七、一三三—一三四頁。

2) 『高麗史』卷一『太祖世家一』、第一三頁。

3) 『高麗史』卷八『文宗世家二』十九年二月甲寅條、第二二八頁。卷九『文宗世家三』三十一年三月乙卯條、第二五三頁。

4) 朴龍雲從高麗時人的語言表述、王建家世、王建集團的地域性等角度立論，對高麗的高句麗繼承意識予以了綜合研究，見前掲氏著『고려의 고구려 계승에 대한 종합적 검토』、第五三—一〇七頁。

5) 『三國史記』卷五十『弓裔傳』、第六八八頁。

者，盡誅殺之」¹⁾。弓裔「以新羅階官郡邑之號悉皆鄙野，改為新制」²⁾。

高麗太祖王建為松嶽豪族，因泰封國內政變而取代弓裔，故高麗王朝以弓裔政權為始基。太祖十七年（九三四年）詔書曾言：「往者新羅政衰，群盜競起，民庶亂離，曝骨荒野。前主服紛爭之黨，啓邦國之基，及乎末年，毒流下民，傾覆社稷。朕承其危緒，造此新邦。」³⁾ 高麗王朝建立後，與新羅相報聘。太祖十八年（九三五年），新羅納土於高麗，王建言及高麗與新羅的關係：「朕與新羅敵血同盟，庶幾兩國永好，各保社稷。」⁴⁾ 新羅敬順王歸附高麗之後，王建「以長女樂浪公主妻之」⁵⁾。樂浪為漢郡名，郡治在平壤城。此時高麗王朝疆宇為原樂浪屬地，故以「樂浪」自代⁶⁾。「樂浪」與「新羅」聯姻帶有朝鮮半島北、南合為一家之意⁷⁾。可見，高麗王朝以泰封為前朝，以新羅為兩國，自不會將其正統性建立於承襲新羅之上。這是高麗王朝強調其半島北方淵源的政治語境⁸⁾。

王建在政變之前，曾借唐商客王昌瑾宣揚讖言以作輿論動員。王昌瑾所持銅鏡銘文曰：「上帝降子於辰、馬，先操雞，後搏鴨。於巳年中二龍見，一則藏身青木中，一則顯形黑金東。」文人宋含弘、白卓、許原等解之曰：

「上帝降子於辰、馬者，謂辰韓、馬韓也。二龍見，一藏身青木，一顯形黑金者，青木，松也，松嶽郡人，以龍為名者之孫，今波珍馔侍中（王建）之謂歟。黑金，鐵也，今所都鐵圓之謂也。今主上初興於此，終滅於此之驗也。先操雞、後搏鴨者，波珍馔侍中先得雞林，後收鴨綠之意也。」⁹⁾

無論松嶽、鐵圓，還是鴨綠，皆在朝鮮半島北部，為高句麗故地，在政治話語中被賦予了「天命」的神聖性。高麗王朝建立後，太祖二年定都於松嶽之陽，為開州創宮闕，後更名皇都、開城府¹⁰⁾。『三國史記』卷三十五『雜誌第四·地理』：

1) 『三國史記』卷五十『弓裔傳』、第六八八頁。

2) 『高麗史』卷一『太祖世家一』元年夏六月詔、第二十頁。

3) 『高麗史』卷二『太祖世家二』十七年夏五月乙巳詔、第三七頁。

4) 『高麗史』卷二『太祖世家二』十八年十二月壬申條、第三九頁。

5) 『三國史記』卷十二『新羅本紀·敬順王』九年冬十月條、第一七〇頁。

6) 『三國遺事』卷一『紀異』「樂浪國」條：「又百濟溫祚之言曰：東有樂浪，北有靺鞨。則殆古漢時樂浪郡之屬縣之地也。新羅人亦以稱樂浪，故今本朝亦因之，而稱樂浪郡夫人，又太祖降女於金傅，亦曰樂浪公主。」第三三—三四頁。

7) 高麗景宗於繼位當年冬十月甲子加政丞金傅為尙父制曰：「我太祖始修睦鄰之好，早認餘風；尋頒駙馬之姻，內酬大節。家國既歸於一統，君臣宛合於三韓。顯播令名，光崇懿範。」『高麗史』卷二『景宗世家』元年冬十月甲子條、第五五頁。

8) 矢木毅認為，高麗之國號選擇除了反映其高句麗繼承意識，以與新羅、後百濟相抗外，還反映了其「北進政策」，意圖經略對其軍事「霸權」之確立有切實作用的女真人。前揭氏著『韓國·朝鮮史の系譜——民族意識·領域意識の變遷をたどる』、第九一—九四頁。

9) 『三國史記』卷五十『弓裔傳』、第六八九—六九〇頁。

10) 『高麗史』卷五十六『地理志一』王京開城府條、第一七八二頁。

『三國遺事』的「朝鮮」敘事與高麗王朝正統性之再塑造

「開城郡，本高句麗冬比忽，景德王改名，今開城府。領縣二：德水縣，本高句麗德勿縣，景德王改名，今因之。第十一葉文宗代創置興王寺於其地，移其縣於南。臨津縣，本高句麗津臨城，景德王改名，今因之。」

上引『三國遺事』注阿斯達地望一說為「今白嶽宮，在開城東」。按『高麗史』卷七七『百官志二』「諸司都監各色」「三蘇造成都監」：「明宗四年（一一七四年）制：左蘇白嶽山、右蘇白馬山、北蘇箕達山置延基宮闕造成宮。」可見白嶽山被作為宮闕的延基之處。白嶽宮始建於高宗四年（一二一七年）十二月庚戌。高宗十五年（一二二八年）十二月甲子，「命樞密院副使李允誠奉御衣帶移安於白嶽假闕」¹⁾。恭愍王九年（一三六〇年）秋七月乙卯朔，「幸白嶽，相視遷都之地」。辛未，「始營白嶽宮闕」，「時人謂之新京」²⁾。『高麗史』卷三十九『恭愍王世家』稱：「白嶽在臨津縣北五里。」如上引『三國史記』卷三十五『雜誌第四·地理』所言，臨津縣為開城府屬縣。可見，無論是十三世紀高宗時代營建的白嶽宮，還是十四世紀恭愍王所營建的白嶽宮均在開城或其屬縣附近。

阿斯達地望另一說為「白嶽，在白州地」。白州地望在開城以西，亦屬高句麗故土。按『高麗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三』，「白州，本高句麗刀臘縣（一云雉嶽城）。新羅景德王改名雉澤，為海臯郡領縣。高麗初，更今名。顯宗九年，屬平州。毅宗十三年，創免山重興闕，升知開興府事，後復舊名，來屬。高宗四十六年，以衛社功臣李仁植內鄉，升為忠翊縣令官。元宗十年，又以衛社功臣趙璫內鄉，升知復興郡事。恭愍王十八年，避侍中慶復興之名，還稱白州。別號銀川（成廟所定）。有溫泉。」在一然撰寫『三國遺事』的忠烈王時代，白州稱復興郡。「還稱白州」，當在恭愍王十八年（一三六九年）之後。高麗毅宗（一一四六—一一七〇年在位）曾在白州修建離宮，以行朝賀儀禮。『高麗史』卷十八『毅宗世家』載毅宗十二年八月白州宮闕的營建之議：

「甲寅，太史監候劉元慶奏：「白州免山半月岡，實我國重興之地，若營宮闕，七年之內，可吞北虜。」於是，遣平章事崔允儀等相風水，還奏曰：「山朝水順，可營宮闕。」王然之。」

矢木毅據以認為這一宮殿建設選址白州，是受到妙清思想的影響，試圖以風水、「厭勝」思想克制「北虜」女眞³⁾。『三國遺事』本注記載「白嶽，在白州地」之說，显然是對妙清思想的接受。

1) 『高麗史』卷二十二『高宗世家』十五年十二月甲子條、第七〇三頁。

2) 『高麗史』卷三十九『恭愍王世家』九年秋七月條、第一二二九頁。尹澤上書恭愍王反對營建白嶽宮。『高麗史』卷一百六『尹澤傳』、第三二七—三二七二頁。

3) 前掲矢木毅『韓國·朝鮮史の系譜——民族意識·領域意識の變遷をたどる』、第一二六一—一二七頁。

在敘述『魏書』所載檀君「朝鮮」之後，一然又引『古記』糝合桓雄、虎熊及檀君三個祖先神話。檀君是桓因庶子桓雄與熊女所生，這一起源敘事為東方諸民族創造了共同的始祖。高句麗始祖朱蒙、百濟始祖溫祚為直接繼承檀君血統的子孫，新羅赫居世統帥「六村」之人為「箕子朝鮮」因「衛滿朝鮮」之興逃亡「三韓」之地者，沃沮為高句麗屬民，濊貊為扶餘·高句麗同系民族。從「檀君」領域觀出發，統一了高句麗、百濟、新羅等「三韓」的新羅及高麗，君臨「九韓」等周邊民族（日本、中華、吳越、托羅、鷹遊、靺鞨、丹國、女狄、濊貊）之上¹⁾。『三國遺事』記述桓雄「率徒三千，降於太伯山頂」，本注云太伯山「即太伯，今妙香山」²⁾。按『三國史記』卷三二『祭祀志』，統一新羅王朝將太伯山視作五嶽中的北嶽，在祭祀制度享受「中祀」³⁾。妙香山在平壤西北，「檀君」神話中的地望皆在漢江以北的朝鮮半島北部。矢木毅認為「檀君」神話的形成與高麗面臨蒙古軍事壓力的政局有關，特別是高宗四十五年（一二五八年）崔氏政權崩壞之際，東北邊境土豪趙暉投降蒙古軍，蒙古在和州設雙城總管府，元宗十一年（一二七〇年）高麗王朝自江華島再遷都開京之際，西北邊境土豪崔坦投降蒙古軍，蒙古在西京平壤設置東寧府管轄慈悲嶺以北的土地，高麗王朝面臨嚴重的北境危機。在這一局勢面前，百年前金人崛起之際「西京聖人」妙清等人宣揚的佛、仙相混淆的、盛行於平壤一帶的「八聖」土俗信仰得以進一步發展，「檀君」成為妙清一派所宣揚各種神格的具象化⁴⁾。

「檀君」神話根源於平壤的土俗信仰，在『三國遺事』敘事中，檀君「朝鮮」都城地處半島北方，這一地域與高麗王畿相近，也曾為高句麗領域。經此地域空間的一致性可將高麗王朝的正統性上延至中國的堯時代，「朝鮮史」的開端其實便是高麗王朝的開端。

『三國遺事』以朝鮮開國時間「與堯同時」。司馬遷曾言「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⁵⁾其論五帝史，以堯為信史開端。一然將檀君定位為「與堯同時」，顯然是取司馬遷信史之說，並意在將朝鮮史上升至與中國信史並列的地位。經十三世紀『三國遺事』的塑造與傳播，到高麗王朝後期，朝鮮開國時間「與堯同時」，已經被廣泛接受。高麗末年，李成桂率軍渡過鴨綠江，侵入元朝疆界之內，張榜於金復州等處：

「本國與堯並立，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賜之履，西至於遼河。世守疆域。元朝一統，

1) 前掲矢木毅『韓國・朝鮮史の系譜——民族意識・領域意識の變遷をたどる』、第一四一—一四四頁。

2) 『三國遺事』卷一『紀異』、第三〇頁。

3) 『三國史記』卷三十二『雜志第一・祭祀』、第四四—一頁。

4) 前掲矢木毅『韓國・朝鮮史の系譜——民族意識・領域意識の變遷をたどる』、第一二七—一三二、一三八—一四一頁。

5)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一九五九年、北京、中華書局）、第46頁。

『三國遺事』的「朝鮮」敘事與高麗王朝正統性之再塑造

螿降公主，遼瀋地面以爲湯沐，因置分省。」¹⁾

「與堯並立」已經成爲高麗王朝的官方歷史認知，並以此宣告於華夏民眾。

三、「平壤」認同及高麗王朝歷史傳統之塑造

關於「朝鮮」地名，除「阿斯達」外，一然所引『古記』還提出「平壤」、「藏唐京」兩處。「藏唐京」與「太伯山」、「平壤」、「阿斯達」等地名在「檀君」神話中的出現，其實反映了高麗時代各地山神信仰被納入到統一敘事中²⁾。關於平壤，『史記』卷一一五『朝鮮列傳』記載衛滿建衛氏朝鮮，「都王險」。『正義』引『括地志』云：「高驪都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地也。」³⁾『後漢書』卷八十五『東夷·沃沮傳』李賢注云：「平壤卽王險城也。」⁴⁾可見唐人將「朝鮮地」、衛氏朝鮮都城、漢樂浪郡城、高句麗都城連綴起來，看作是一地。這一看法爲『三國遺事』所繼承，『紀異』篇「樂浪國」條云：

「前漢時，始置樂浪郡。應邵曰：故朝鮮國也。新唐書注云：平壤城，古漢之樂浪郡也。」

高麗太祖元年（九一八年）九月丙申諭群臣曰：「平壤古都荒廢雖久，基址尙存，而荆棘滋茂，蕃人遊獵於其間，因而侵掠邊邑，爲害大矣。宜徙民實之，以固藩屏，爲百世之利。」⁵⁾於是設官守平壤，並於次年築城。諭書中所描繪的是高麗王朝建國之初平壤荒廢的場景。『三國史記』卷三十七『雜志第六·地理』：「平壤城似今西京，而溟水則大同江是也。」金富軾根據『唐書』相關記載推測高麗西京平壤爲高句麗都城平壤，但他不敢下斷言。之所以如此，因平壤在唐羅戰爭後已經被毀棄，與高麗西京並無直接繼承關係。

新羅文武王十一年（六七一年），文武王報書唐朝行軍總管薛仁貴稱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已經許諾「平壤已南百濟土地，並乞你新羅」⁶⁾。經過唐羅戰爭及外交交涉，新羅聖德王三十四年（七三五年），唐朝賜溟江（大同江）以南地於新羅⁷⁾。新羅勢力最北抵達大同江支

1) 『高麗史』卷一一四『池龍壽傳』、第三四九三頁。

2) 前掲矢木毅『韓國·朝鮮史の系譜——民族意識·領域意識の變遷をたどる』、第一三二頁。

3) 『史記』卷一百十五『朝鮮列傳』、第二九八五頁。

4) 『後漢書』卷八十五『東夷傳』（一九六五年、北京、中華書局）、第二八一六頁。

5) 『高麗史』卷一『太祖世家一』元年九月丙申條，第二二頁。

6) 『三國史記』卷七『新羅本紀七·文武王』十一年秋七月條、第九四頁。關於文武王報書的真偽，拜根興進行考辨，見氏著『七世紀中葉唐與新羅關係研究』（二〇〇三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八五—八八頁。

7) 『三國史記』卷八『新羅本紀八·聖德王』三十四年春正月條，第一二〇頁。

流南江（能成江）、泥河（龍興江），實際控制線在慈悲嶺到鐵關一線¹⁾。新羅將所獲高句麗之地分為漢州、朔州、溟州。賈耽『古今郡國志』云：朔州，「濊之西，古貊地」；溟州，「蓋濊之古國」²⁾。三州之中漢州最西，居於平壤正南，但漢州以漢江流域為中心，州治地處高麗時代的廣州，所轄郡縣遠不到大同江流域。為了表明「三韓」統一之義，新羅將「溟江」之名由大同江移至禮成江，將「平壤」之名由高句麗都城移至漢陽郡，即「南平壤」。所謂「南平壤」之「南」，乃是統一新羅時代為了區分原平壤而作的地理標識³⁾。王建稱平壤「荒廢雖久」、「蕃人遊獵於其間，因而侵掠邊邑」，可見原平壤在新羅、高麗初期屬邊邑之外。

見諸中國史籍的高句麗都城「平壤」，其實是多個城。高句麗都城屢次遷徙。按『三國史記』卷一十七『高句麗本紀五·東川王』所載：

「二十一年春二月，王以丸都城經亂，不可復都，築平壤城，移民及廟社。平壤者，本仙人王儉之宅也。或云王之都王儉。」

此前一年，即曹魏正始七年（二四六年），幽州刺史田丘儉屠高句麗都城丸都，玄菟太守王頎逐東川王至肅慎南界，刻石紀功⁴⁾。高句麗都城平壤城為東川王二十一年（二四七年）新築。金富軾所謂「或云王之都王儉」，認為高句麗平壤與王儉城地望相合，即採用前述唐人觀點。「仙人王儉之宅」的傳說，表明晚至十二世紀金富軾編撰『三國史記』時，「王儉」已經由地名被傳說成仙人之名。

高句麗故國原王四年（三三四年）秋八月，「增築平壤城」。十三年（三四三年）春二月，「移居平壤東黃城，城在今西京東木覓山中」⁵⁾。金富軾在『三國史記』卷三十七『雜誌第六·地理』中複述這段記載後，又云「不可知其然否」，對高句麗遷都地望在木覓山持保留意見⁶⁾。此時正逢妙清學說盛行之時，其所宣揚的「八聖」中有「駒麗木覓仙人」。同時，南平讓亦有木覓山（今首爾南山），有一種說法將壇君隱遁的「阿斯達」擬定為此地⁷⁾。金富軾為「開京派」的代表人物，在遷都問題上為「西京派」的政敵，其對妙清一派所宣揚的木覓山之神話與歷史持懷疑態度。

-
- 1) 前掲矢木毅『韓國・朝鮮史の系譜——民族意識・領域意識の變遷をたどる』、第七五頁。
 - 2) 『三國史記』卷三十五『雜誌第四·地理』、四八三、四八六頁。
 - 3) 前掲矢木毅『韓國・朝鮮史の系譜——民族意識・領域意識の變遷をたどる』、第七五一—八〇頁。
 - 4) 『三國志』卷二十八『田丘儉傳』（一九五九年、北京、中華書局）、第七六二頁。
 - 5) 『三國史記』卷十八『高句麗本紀六·故國原王』四年秋八月條、第二一九頁。十三年春二月條、第二二〇頁。
 - 6) 『三國史記』卷三十七『雜誌第六·地理』：「而或云故國原王十三年，移居平壤東黃城，城在今西京東木覓山中。不可知其然否」。第五〇八頁。
 - 7) 前掲矢木毅『韓國・朝鮮史の系譜——民族意識・領域意識の變遷をたどる』、第一二八一—一三〇頁。

『三國遺事』的「朝鮮」敘事與高麗王朝正統性之再塑造

長壽王十五年（四二七年），高句麗移都平壤¹⁾。平原王二十八年（五八六年），高句麗移都長安城²⁾。唐朝平定高句麗時所攻陷之平壤即高句麗長安城，唐朝在此設安東都護府³⁾。

又據『三國史記』卷三十五『雜志第四·地理』：

「漢陽郡，本高句麗北漢山郡（一云平壤），眞興王爲州，置軍主，景德王改名，今楊州舊墟。」

同書卷十『新羅本紀·憲德王』：「十七年（八二五年）春正月，憲昌子梵文，與高達山賊壽神等百餘人，同謀叛，欲立都於平壤，攻北漢山州。都督聰明率兵捕殺之。」金富軾注曰：「平壤，今楊州也。太祖制莊義寺齋文有「高麗舊壤，平壤名山」之句。」除了高句麗故都平壤城、長安城之外，九世紀統一新羅時代將高句麗北漢山郡、後世高麗王朝楊州所在地也稱爲平壤，此即前文所述之「南平壤」⁴⁾。

在高麗、新羅、後百濟三國相爭時，因高麗地處高句麗故地，故平壤成爲高麗代稱。如甄萱寄書王建言：「所期者掛弓於平壤之樓，飲馬於溟江之水。」⁵⁾ 在高麗王朝「北進政策」中，平壤成爲其經略北方的重鎮⁶⁾。成宗八年（九九五年）九月己卯教曰：「憑茲平壤之雄都，固我祖宗之霸業。」⁷⁾ 仁宗四年（一一二七年），高麗侵奪遼朝保州之舉獲金朝認可，仁宗上表云「平壤舊墟，限於鴨綠」⁸⁾。將平壤地望由大同江流域北推至鴨綠江流域，以作爲向北拓地的歷史依據。

在一然生活的時代，西京平壤一直是蒙、麗戰爭的核心地區。高宗十八年（一二三一年），蒙兵攻西京城。次年，西京人不滿西京巡撫使大將軍閔曦等預謀殺蒙古達魯花赤，故而反叛。經此一役，「西京遂爲丘墟」。高宗三十七年（一二五〇年），「北界州民皆內徙西京畿內及西海道」，西京成爲高麗北界民眾的集中地⁹⁾。高宗四十五年（一二五八年），蒙古屯兵西京，傳蒙古皇帝敕云：「今國王及太子出降西京，則便可回兵。」¹⁰⁾ 次年四月，高麗太子入朝，六月高宗死，權臣擁立太孫「入大內權監國事」，蒙古兵護送太子即位，即爲元宗¹¹⁾

1) 『三國史記』卷十八『高句麗本紀六·長壽王』十五年條、第二二五頁。

2) 『三國史記』卷十九『高句麗本紀七·平原王』二十八年條、第二三九頁。

3) 『三國史記』卷二十二『高句麗本紀十·寶藏王』二十七年冬十月條、第二七一頁。卷三十七『雜志第六·地理』、第五〇八頁。

4) 苗威：「高句麗「平壤城」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二〇〇一年第二輯）。

5) 『高麗史』卷一『太祖世家一』十年十二月條、第二八頁。

6) 前掲矢木毅『韓國·朝鮮史の系譜——民族意識·領域意識の變遷をたどる』、第八八—九〇頁。

7) 『高麗史』卷三『成宗世家』八年九月乙卯條、第七一頁。

8) 『高麗史』卷十五『仁宗世家』四年十二月癸酉條、第四四九頁。

9) 『高麗史』卷二十三『高宗世家二』三十七年三月癸未條、第七三八頁。

10) 『高麗史』卷二十四『高宗世家三』四十五年六月丙申條、第七七一頁。

11) 『高麗史』卷二十五『元宗世家一』元年二月、三月條、第七八五—七八六頁。

。「元宗十年（一二六九年），西北面兵馬使營記官崔坦、三和校尉李延齡等作亂，殺留守，以西京及諸城叛附於蒙古，蒙古以西京爲東寧府，置官吏，畫慈悲嶺爲界，忠烈王十六年（一二九〇年），元歸我西京及諸城，遂復爲西京留守官。」¹⁾ 一然親見蒙古侵西京、「西京遂爲丘墟」、「蒙古以西京爲東寧府」等重大事件，卻在元朝歸還西京之前一年去世。

西京平壤爲高麗門戶，在戰爭喪亂中儼然成爲高麗王朝國運的象徵。前述徐熙、妙清的高句麗繼承意識、平壤意識即爲高麗與遼、金對抗的產物。有鑒於蒙、麗戰爭中西京的得失沉浮，高麗時人增強平壤認同，並經由平壤認同，再次強化以平壤爲都城的朝鮮認同與高句麗認同。『三國遺事』卷一『紀異』：

「唐裴矩傳云。高麗本孤竹國（本注：今海州）。周以封箕子爲朝鮮，漢分置三郡。謂玄菟、樂浪、帶方（本注：北帶方）。通典亦同此說。（本注：漢書則真、臨、樂、玄四郡，今云三郡。名又不同，何耶。）」

典出『新唐書』卷一百『裴矩傳』，但這段文字在『新唐書』原文上有所改動，原文作：

「從帝巡塞北，幸啟民帳。時高麗遣使先在突厥，啟民引見帝。矩因奏言：「高麗本孤竹國，周以封箕子，漢分三郡，今乃不臣，先帝疾之，欲討久矣。方陛下時，安得不事？今其使朝突厥，及見啟民，舉國臣服，脅令入朝，可致也。請面詔其使，令歸語王，有如旅拒，方率突厥誅之。」帝納焉。高麗不聽命，征遼自此始。」²⁾

『裴矩傳』這段文字的重要性在於，裴矩勾勒了「孤竹—箕子朝鮮—漢三郡—高麗」的歷史譜系，這一歷史認識強化了隋朝臣服高句麗的歷史責任，由此開啟了隋煬帝征高句麗之舉。一二五九年，忽必烈稱汗前夕，接見時爲被迫入朝的高麗太子（高麗元宗，次年繼位），忽必烈將高麗等同於高句麗，並以降服高麗爲稱汗之天意，其言曰：「高麗萬里之國，自唐太宗親征而不能服，今其世子自來歸我，此天意也。」³⁾ 忽必烈以唐太宗不能征服，而自己卻可以征服高麗，作爲天意的依據。可見朝鮮半島歷史會對高麗王朝的現實處境產生重要的影響。

正因如此，高麗王朝反過來也會強化對朝鮮、高句麗的歷史認同，並通過喚起歷史記憶來爲高麗王朝尋找正統性。高麗王朝的高句麗繼承意識，在建國之初是爲了與新羅、後百濟相抗、並緣飾「北進政策」，此後則是在遼、金、蒙古的刺激下因民族自尊意識高漲而不斷強化。尤其是關於太祖王建祖先來自於「太白山」的傳說，實際上是高麗後期檀君神話形成後的產物⁴⁾。

1) 『高麗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三』西京留守平讓府條、第一八六三頁。

2) 『新唐書』卷一百『裴矩傳』（一九七五年、北京、中華書局）、第三九三二—三九三三頁。

3) 『高麗史』卷二十五『元宗世家一』、第七八七頁。

4) 前掲矢木毅『韓國・朝鮮史の系譜——民族意識・領域意識の變遷をたどる』、第九〇—九〇

『三國遺事』的「朝鮮」敘事與高麗王朝正統性之再塑造

『高麗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三』記載了平壤城內箕子朝鮮與高句麗的遺跡：

「古城基二，（一箕子時所築，城內畫區用井田制。一高麗成宗時所築。）箕子墓、（在府城北甌山上。）、東明王墓、（在府東南中和境龍山，俗號「真珠墓」。又仁里坊有祠宇，高麗以時降御押，行祭，朔望亦令其官行祭。邑人至今有事輒禱。世傳東明聖帝祠。）、乙密臺。（臺在錦繡山頂，臺下層崖之旁。有永明寺，即東明王九梯宮，內有麒麟窟，窟南白銀灘。有巖出沒潮水，名曰朝天石。）」

『高麗史』稱這些遺跡為「俗號」、「世傳」，書法意在表明其不可信。如前文所述，高麗王朝建立之初，「平壤古都，荒廢雖久」，對於編撰高麗史的朝鮮王朝時人而言，這些「俗號」、「世傳」形成於高麗王朝時代。『高麗史』卷六十三『禮志五』載高麗肅宗七年（一一〇二年）：

「十月壬子朔，禮部奏：「我國教化禮義自箕子始，而不載祀典。乞求其墳塋立祠以祭。」從之。」

同卷又載肅宗十年（一一〇五年）八月甲申，「遣使祭東明聖帝祠，獻衣幣」。

『高麗史』卷十三『睿宗世家二』載睿宗四年（一一〇九年）四月乙酉，「遣同知樞密院事許慶，祭平壤木覓東明神祠」。

箕子、高句麗始祖東明，皆在十二世紀時被納入到高麗王朝的官方祭祀體系中，並伴隨有相應的立祠舉動。

『高麗史』卷七十一『樂志二』「西京」條載：

「西京，古朝鮮即箕子所封之地。其民習於禮讓，知尊君親上之義，作此歌言仁恩充暢，以及草木，雖折敗之柳，亦有生意也。」

如上文所述，高麗建立之初平壤的實相為「蕃人遊獵於其間，因而侵掠邊邑，為害大矣」，未曾「其民習於禮讓、知尊君親上之義」。然而在高麗王朝的意識形態塑造中，平壤已經成為「教化禮義」之淵藪¹⁾。西京平壤在蒙、麗戰爭中的得失，進一步激發高麗人對平壤的認同，甚至認為平壤民歌也充滿了「生意」。通過平壤認同，朝鮮認同、高句麗認同被賦予了「教化禮義」認同的內涵。朝鮮王朝編撰『高麗史』時，已經完全形成了「檀君朝鮮—箕子朝鮮—衛滿朝鮮—漢四郡—高句麗—高麗」的歷史譜系²⁾。

一頁。

- 1) 金光洙認為高麗以朝鮮為國家的前代，從教化論立場重視朝鮮的文化價值，見「高麗朝의 高句麗繼承意識과 古朝鮮認識」（『歷史教育』第四十三輯、一九八八年、서울、歷史教育研究會）。
- 2) 關於朝鮮王朝初期五次編修高麗國史的黨爭背景與學派背景，參見楊軍『朝鮮王朝前期的古史編纂』第二章「圍繞『高麗國史』的鬥爭」（二〇一三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五〇—一〇五頁。

「西京留守官平壤府，本三朝鮮舊都。唐堯戊辰歲，神人降於檀木之下，國人立爲君，都平壤，號檀君，是爲前朝鮮。周武王克商，封箕子於朝鮮，是爲後朝鮮。逮四十一代孫準時，有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來奪準地，都於王險城（險一作儉，卽平壤。）是爲衛滿朝鮮。其孫右渠不肯奉詔，漢武帝元封二年，遣將討之，定爲四郡，以王險爲樂浪郡。高句麗長壽王十五年，自國內城徙都之。寶藏王二十七年，新羅文武王與唐夾攻滅之，地遂入於新羅。太祖元年，以平壤荒廢，量徙鹽、白、黃、海、鳳諸州民以實之，爲大都護府，尋爲西京。」¹⁾

上引『高麗史』的歷史敘事以平壤爲中心環節。這一歷史譜系是在接受了唐人史觀後，經由以『三國遺事』爲代表的高麗史籍塑造完成。這一歷史譜系的建構隱含著十三世紀蒙、麗戰爭中以平壤爲「教化禮義」淵藪、通過朝鮮史、高句麗史再次塑造高麗王朝正統性的意圖。

四、從「朝鮮」到「二府七十二國」： 高麗王朝「東方一統」的歷史溯源

『三國遺事』卷一『紀異』「魏滿朝鮮」條以『漢書』卷九十五『朝鮮傳』爲史源，對衛氏朝鮮興衰進行了再敘述。「馬韓」條曰：

「魏志云：「魏滿擊朝鮮，朝鮮王準率宮人左右，越海而南至韓地，開國號馬韓。」甄萱上太祖書云：「昔馬韓先起，赫世勃興，於是百濟開國於金馬山。」崔致遠云：「馬韓，麗也。辰韓，羅也。」（本注：據本紀，則羅先起甲子、麗後起甲申，而此云者，以王準言之耳。以此知東明之起，已并馬韓而因之矣，故稱麗爲馬韓。今人或認金馬山，以馬韓爲百濟者，蓋誤濫也。麗地自有馬邑山，故名馬韓也。）」

文中「魏志」具體指『三國志』卷三十『東夷傳』，朝鮮王準所稱爲「韓王」。甄萱所云，見於『三國史記』卷五十『甄萱傳』，爲「謂左右」而言。崔致遠所云，見於『三國史記』卷四十六『崔致遠傳』所載『上太師侍中狀』。矢木毅認爲將高句麗附會爲馬韓的說法，源自『後漢書』卷八十五『東夷傳』中高句麗王宮率馬韓圍攻玄菟郡的記載。至唐代，「高句麗·馬韓說」成爲普遍觀念，崔致遠的觀念即來源於此。高麗既然以高句麗爲正統，意在與源自辰韓的新羅相區別，自會接受「高句麗·馬韓說」²⁾。

前引『三國遺事』本注在高麗王朝正統性的思想脈絡中採納「高句麗·馬韓說」：「東明之起，已并馬韓而因之矣，故稱麗爲馬韓。」由此構建了「朝鮮—馬韓—高句麗」的歷

1) 『高麗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三』、第一八六二—一八六三頁。

2) 前掲矢木毅『韓國·朝鮮史の系譜——民族意識·領域意識の變遷をたどる』、第五八一—六二二頁。

史譜系。不僅如此，「朝鮮王」南至韓地稱「韓王」，朝鮮半島北部遺民南遷，使得原本孤立的南部地區也成為「朝鮮史」的演繹場所。『三國遺事』卷一『紀異』「七十八國」條：

「通典云：「朝鮮之遺民，分爲七十餘國，皆地方百里。」後漢書云：「西漢以朝鮮舊地，初置爲四郡，後置二府。法令漸煩，分爲七十八國，各萬戶。」（本注：馬韓在西，有五十小四邑，皆稱國。辰韓在東，有十二小邑，稱國。下韓在南，有十二小邑，各稱國。）」

『通典』卷一八五『邊防一』載馬韓、辰韓、辨辰「凡七十八國」之說，然而卻無「朝鮮之遺民」的表述。所謂「朝鮮之遺民」，『三國志』卷三十『東夷傳』載朝鮮王準走入海時有「其左右宮人」，『後漢書』卷八十五『東夷傳』載其人數爲「其餘眾數千人」。蓋『三國遺事』將『通典』所載「七十八國」視爲「朝鮮之遺民」所建。由此，在『三國遺事』的「朝鮮」敘事中，因「朝鮮之遺民」在半島南部建立「七十八國」，「朝鮮史」的範圍擴大到全朝鮮半島。

在半島北方，是「衛滿朝鮮—漢四郡—公孫氏」的歷史譜系。『三國遺事』卷一『紀異』「二府」條曰：

「前漢書：「昭帝始元五年己亥，置二外府。」謂朝鮮舊地平那及玄菟郡等爲平州都督府。臨屯、樂浪等兩郡之地置東部都尉府。（本注：私曰：『朝鮮傳』則眞番、玄菟、臨屯、樂浪等四，今有平那無眞番，蓋一地二名也。）」

相關記載見於『後漢書』卷八五『東夷傳』，「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眞番，以并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單大領已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平州都督府」應指東漢末年公孫度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¹⁾。從東漢中平六年（一八九年）公孫度佔據遼東，至曹魏景初二年（二三八）年公孫淵被司馬懿攻殺，公孫氏統治遼東、帶方、樂浪、玄菟等郡長達五十年。公孫淵被魏明帝封爲樂浪公，後又「自立爲燕王，置百官有司」²⁾。從朝鮮半島的立場來看，公孫氏爲佔據半島北部的獨立勢力，這是『三國遺事』將樂浪稱爲「樂浪國」的歷史依據所在。在「北帶方」條中，『三國遺事』本注稱樂浪、帶方二郡，「其後僭稱國」³⁾。帶方原爲樂浪郡屬縣⁴⁾。「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爲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興兵伐韓濊，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⁵⁾「僭稱國」正是對公孫氏割據遼東、帶方、樂浪、玄菟等郡的描述。「衛滿朝鮮—漢四郡—公孫氏」是朝鮮半島北部前後延續的政治實

1) 『三國志』卷八『公孫度傳』、第二五二頁。

2) 『三國志』卷八『公孫度傳』、第二五四、二六〇—二六一頁。

3) 『三國遺事』卷一『紀異』、第三四頁。

4) 『後漢書』志二十三『郡國志五』、第三五三〇頁。

5) 『三國志』卷三十『東夷傳』、第八五一頁。

體。

朝鮮半島南、北方的兩條政權沿襲線索，在魏明帝的征伐中被關聯起來。『三國志』卷三十『東夷傳』：

「景初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於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衣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智激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時太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

魏明帝平定公孫氏後，越海平定帶方、樂浪二郡。因「吏譯轉有異同」，「諸韓國」與二郡發生衝突，衝突的結果是「滅韓」。『三國遺事』卷一『紀異』「南帶方」條曰：

「曹魏時始置南帶方郡。（本注：今南原府）故云：帶方之南，海水千里，曰瀚海。（本注：後漢建安中，以馬韓南荒地為帶方郡，倭韓遂屬，是也。）」

『三國遺事』所謂「曹魏時始置南帶方郡」，本注認為南帶方郡的地望在高麗南原府。高麗南原府，即統一新羅的南原小京，為五京之一。按『三國史記』卷三十六『雜誌第五·地理』，

「南原小京，本百濟古龍郡，新羅并之。神文王五年初置小京，景德王十六年置南原小京，今南原府。」。

南原小京遠在漢江以南，為朝鮮半島西南方中心，戰略位置十分重要。『高麗史』卷五十七『地理志二』言「唐高宗詔劉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按『舊唐書』卷八十四『劉仁軌傳』，劉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代（王）文度統眾」，王文度時為熊津都督。可知，唐人「帶方州」地域範圍或可涵蓋朝鮮半島西南之地。

據『三國志』卷三十『東夷傳』，「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為限」。『三國遺事』所述「帶方之南，海水千里」，只能是「滅韓」以後的結果。「倭韓遂屬」，本是上引『三國志』用以表述建安中公孫康初立帶方郡的用語。『三國遺事』本注在「南帶方郡」條下再次引用，意在表明曹魏帶方郡的管轄範圍依舊包含倭、韓。曹魏所立帶方郡，其地域範圍更較公孫氏帶方郡為大。這或許是『三國遺事』列南、北帶方郡條目的原因。

『三國遺事』「南帶方」條的這一敘事被『高麗史』卷五十七『地理志二』所吸納：「南原府，本百濟古龍郡。後漢建安中，為帶方郡。曹魏時，為南帶方郡。」這是『三國史記』卷三十六『雜誌第五·地理』所沒有的內容，顯然源自『三國遺事』的理解。正因如此，在『三國遺事』的朝鮮敘事中，半島北方的歷史，因為「朝鮮之遺民」建「七十八國」而延續到半島南方，再由北方政權（「南帶方郡」）將其統治範圍囊括到南方，由此完成全半島的整體歷史運動。在這一過程中，因「朝鮮—馬韓—高句麗」歷史譜系的存在，朝鮮史的正統性仍然可傳遞到高麗王朝。

高麗王朝末年，趙浚上疏曰：

『三國遺事』的「朝鮮」敘事與高麗王朝正統性之再塑造

「東方自朝鮮之季，離爲七十，合爲三韓。干戈爛熳而相尋，生民之肝腦塗地者，歷兩漢、三國、六朝、隋唐，迄于五代而未息。我太祖受命，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南征北旆，始成一統，垂五百年於茲矣。」¹⁾

恭讓王元年（一三八九年），恭讓王告太祖祝文曰：

「朝鮮之季，國分鎔銖，至七十八，弱吐強吞，併爲三雄，戰爭不息。聖祖龍興，天戈所指，群盜削平，金傅作賓，甄萱來庭，神劍授首，一統以成，子孫相傳四百五十有七年。」²⁾

高麗王朝末期，較之此前出現了更明確的「一統」意識，這固然是麗、鮮之際改朝換代的需要，即需要明確正統傳承，高麗王辛禑「本非王氏，不可以奉宗祀」被廢殺³⁾。末代高麗王恭讓王也在「今王昏暗，君道已失，人心已去，不可以爲社稷生靈主」的罪名下被廢⁴⁾。但這種「一統」意識以「朝鮮史」爲開端，以「七十八國」爲分裂，以高麗王朝爲「一統以成」，正與『三國遺事』以「朝鮮」敘事來塑造高麗王朝正統性的史觀相同。由此可見『三國遺事』史觀的政治作用與歷史影響。

結 論

『三國遺事』撰述於高麗忠烈王七年（一二八一年）至十二年（一二八六年）間，是當時高麗王朝撰史活動的一部分。此前高麗與蒙古之間發生了近四十年（一二三一—一二七三年）的戰爭，高麗王朝被逐步納入到蒙古帝國的體制中去。尤其是元宗十年（一二六九年），高麗視爲歷史傳統核心區的西京平壤被蒙古佔領設爲東寧府，高麗王朝的正統性被動搖。『三國遺事』中的「朝鮮」敘事實隱含著爲高麗王朝再塑正統性的因素。

在高麗時人語境中，「朝鮮」與「卞韓」等地名相對，僅指半島北部地區。高麗王朝前承泰封國，將正統性上溯至高句麗，而以新羅爲「兩國」。在『三國遺事』的敘事中，檀君「朝鮮」都城與高麗王畿所在地望一致，且「朝鮮」地處半島北方，高麗王業所基也在半島北方的高句麗境內，經此地域空間的一致性將高麗王朝的正統性伸展至司馬遷所認爲的信史堯時代。「朝鮮史」的開端其實是高麗王朝正統性的開端。

高麗建立之初，平壤「荒廢」、「蕃人遊獵於其間」，地處邊邑之外。高麗太祖築城，後

1) 『高麗史』卷一百十八『趙浚傳』、第三六一六頁。

2) 『高麗史』卷四十五『恭讓王世家一』元年十二月癸亥條，第一三五六頁。

3) 『高麗史』卷四十五『恭讓王世家一』辛昌元年十一月李成桂議，第一三五頁。

4) 『高麗史』卷四十六『恭讓王世家二』四年秋七月辛卯，右侍中裴克廉等白大王妃所云、第一四〇九頁。

升為西京，成為經略北方的重鎮。在高麗王朝的意識形態塑造中，因平壤之與箕子朝鮮的聯繫而被視為「教化禮義」之淵藪。箕子、高句麗始祖東明，皆在十二世紀時被納入到高麗官方的祭祀體系中，平壤成為禮儀空間，並伴隨有相應的古跡認定與「立祠」活動。在蒙、麗戰爭中，西京平壤為高麗門戶，成為高麗王朝國運之象徵，高麗時人由此增強平壤認同，並經由平壤認同，再次強化以平壤為都城的朝鮮認同與高句麗認同。

然而，十二世紀時金富軾已經不敢斷言高麗西京平壤為高句麗都城平壤。除了高句麗故都平壤城、平壤東黃城、長安城之外，九世紀統一新羅時代將高句麗北漢山郡、後世高麗王朝楊州所在地也稱為平壤。將「朝鮮地」、衛氏朝鮮都城、漢樂浪郡城、高句麗都城連綴起來看作是平壤一地，是唐人的觀點。中國王朝對朝鮮半島歷史譜系的認識會對高麗王朝的現實處境產生重要影響，由此成為高麗王朝建構自身歷史的範式。在接受了唐人史觀後，經由以『三國遺事』為代表的高麗史籍塑造，朝鮮王朝初期編撰『高麗史』時，已經形成「檀君朝鮮—箕子朝鮮—衛滿朝鮮—漢四郡—高句麗—高麗」的歷史譜系。這一譜系的核心環節是平壤認同，特別隱含著高麗在蒙古威壓之下，以平壤「教化禮義」、以對朝鮮及高句麗的繼承，重塑高麗王朝正統性的意願。

在『三國遺事』的「朝鮮」敘事中，因「朝鮮王準」南至韓地稱「韓王」，「朝鮮之遺民」在半島南部建立「七十八國」，由此構建了「朝鮮—馬韓—高句麗」的歷史譜系，原本孤立的半島南部地區也被納入到「朝鮮史」之中。半島北方，則是「衛滿朝鮮—漢四郡—公孫氏」的歷史譜系。朝鮮半島南、北兩條政權沿襲線索，因魏明帝收復樂浪、帶方二郡「滅韓」而發生重疊。『三國遺事』以曹魏帶方郡為南帶方郡，並以統一新羅南原小京、高麗王朝南原府為其地望所在，認為「帶方之南，海水千里」，「倭韓遂屬」。因「南帶方郡」的統治範圍囊括半島南方而將整個半島納入同一歷史敘事之中。

經由『三國遺事』以「朝鮮」敘事來塑造高麗王朝正統性，到高麗王朝末期，已經出現「東方一統」的歷史意識。這一意識以「朝鮮史」為開端，以「七十八國」為分裂，以高麗王朝為「一統以成」。這固然是麗、鮮之際改朝換代的需要，但也是『三國遺事』史觀的政治作用與歷史影響的結果。